

# 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再讨论

邵建

**摘要:** 同为香山两大历史名人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比较关注的问题,目前学界的基本共识是:二人早年有着非常好的私交,甚至是“忘年交”;郑观应对年轻时的孙中山多有提携,在上书李鸿章的过程中给予了孙极高评价和重要帮助;郑观应撰写《中外卫生要旨》也曾经借鉴了孙的观点,《盛世危言·农功》系收录自孙中山的《农功》。只是在孙中山走上革命之路后,二人开始疏远。但实际上,历史事实并非如此,郑、孙二人早年并未拥有良好的私交和频繁的交往,在民国以后二人之间也没有任何来往。

**关键词:** 郑观应; 孙中山; 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5833(2014)03-0158-06

**DOI:** 10.13644/j.cnki.cn31-1112.2014.03.022

**作者简介:** 邵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上海 200235)

同为香山两大历史名人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历来是学术界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无论是研究郑观应,还是研究孙中山,许多学者的相关论文都直接关注到了郑、孙二人的关系<sup>①</sup>。此外,夏东元的《郑观应年谱长编》、黄宇和的《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易惠莉的《郑观应评传》等著作中也有相关内容涉及郑、孙关系<sup>②</sup>。这些研究成果大体上都对二人曾经的友谊与交往给予了高度评价和肯定,相对一致的观点是二人早期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特别是在郑观应隐居澳门期间,曾经有频繁的交流,相互切磋救国大计,这也是后来在孙中山上书李鸿章事件中郑观应给予孙中山极高评价和请盛宣怀、盛宙怀兄弟引荐给李鸿章的重要原因,二人关系由热转冷则是由于 1895 年之后孙中山走上了武装推翻清政府的革命之路。

但是,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否如此?二人是否曾经有过良好的私交?是否早年有过频繁的交往

收稿日期: 2013-07-06

<sup>①</sup> 例如,张莘、张磊的《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钟卓安的《郑观应与孙中山》(《岭南文史》1994年第4期),胡波的《孙中山与香山买办》(《广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高兆锦、胡波的《郑观应与孙中山》(载赵德钧主编《孙中山与香山》,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刘居上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前后的郑观应》(载《纪念郑观应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12年版),张磊的《郑观应与孙中山》、黄明同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经济思想的历史传承》、郭展礼的《郑观应对孙中山改革思想之影响》、徐新的《郑观应对孙中山的重大影响》(均载王杰、邓开颂主编《纪念郑观应诞辰一百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03年版)以及张磊的《郑观应与孙中山——纪念郑观应诞辰170周年》(《岭南文史》2012年第3期)等论文。

<sup>②</sup> 夏东元《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 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易惠莉《郑观应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以及基于救国理念和维新思想的互动?在笔者看来都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本文尝试在二人早期的交往、天津上书中二人的交往、郑观应对革命的态度、郑观应对清廷的情感等多个问题上进行探讨,进而客观地评价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

## 一、郑观应与孙中山的早期交往

1885年4月,郑观应在摆脱了香港当局的拘留后,“脱累归里,杜门养病”,至1891年4月担任开平煤矿粤局总办职务后复出,大约6年时间居留在澳门。其间,除设法还债、养病外,郑观应还全力撰写出版了《盛世危言》。孙中山1883年7月从檀香山回乡,之后辗转广州、香港等地学习西医,直到1892年7月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澳门是他往返香港和香山翠亨村的必经之地。郑观应是大名鼎鼎的买办商人、洋务派高官和维新思想家,在商界和思想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孙中山是初出茅庐、满腔救国热情的热血青年,当时正在积极思考国家命运与前途。在救亡图存、维新图强的追求上,二人无疑具有共同语言。同时,郑观应生于香山雍陌乡雍陌村,而孙中山的家乡就在不远处的南朗镇翠亨村,两家相距仅十几公里,从空间距离上来说也很接近。

黄宇和院士在其大作《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中对郑观应隐居澳门期间,郑、孙二人的交往作了这样的设想:

从郑观应之决定把孙中山的《农功》收入他自己的《盛世危言》,则他似乎颇了解孙中山的心情与动机,甚至与他有过多次交谈。这也不奇怪,《盛世危言》在1893年刊刻,那个时候孙中山已经到了澳门行医,很可能经常拜访郑观应,讨论时艰。<sup>①</sup>

黄宇和的设想在目前学术界有关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的讨论中具有代表性。国民党元老冯自由也曾经说郑观应与杨鹤龄、黄咏商、曹善业、何连旺、吴节薇、陈赓虞等人一样曾经是兴中会初期孙中山的“友好及同志”<sup>②</sup>。侯杰在《郑观应:中国现代化的先驱》一文中说“郑观应与孙中山是同乡,一个在翠亨村,一个在雍陌村,郑观应比孙中山大24岁。通过朋友陆皓东的介绍,孙中山结识了郑观应。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期间,两人有过非常密切的交往,郑观应曾经在经济上支持过孙中山。两人在救国问题上志同道合,因此也成为了忘年交。”<sup>③</sup>张磊多年前也在《郑观应与孙中山关系析论》一文中指出,在19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郑观应同孙中山有过颇为密切的交往。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观点都只是一种比较合理的推断,目前并没有史料能够佐证二人的确在香山或者澳门见过面,更不用说有过深入的交谈。

关于这个讨论,必须面对两个小问题。一是《盛世危言》(五)收入《农功》的问题。1890年,孙中山曾致信郑藻如,提议效法西方,对乡政进行改良,提出“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立会设局以禁绝鸦片”和“兴学会设学校以普及教育”三点具体意见,并建议在香山县先实行,然后推广全国<sup>④</sup>。在此基础上,孙中山进一步根据致郑藻如信的内容在1891年前后写就《农功》一文。在《盛世危言·农功》中郑观应特别提到一段话“今吾邑孙翠溪西医颇留心植物之理,……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游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sup>⑤</sup>很显然,孙中山撰写《农功》在前,《盛世危言》出版在后,郑观应的这篇文章的确是在修改孙中山的《农功》基础上完成的<sup>⑥</sup>。但是,笔者认为这段评论可能仅为前辈对后辈的赞赏之词,并不能够充分说明二人有过直接交往甚至密切交往。至于第二个小问题,郑观应撰写《中外卫生要旨》曾经得到孙中山的帮助,同样也是合理推断,缺乏史料的进一步支持。目前无论是孙中山,或者郑观应存

① 黄宇和《三十岁前的孙中山:翠亨、檀岛、香港1866-1895》,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486页。

② 参见《兴中会初期孙总理之友好及同志》,载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7、20页。

③ 《中山日报》2008年4月5日,第4828期,B1版。

④ 孙中山《致郑藻如书》,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页。

⑤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7页。

⑥ 孙中山所作《农功》原文已失,所以很难弄清楚郑观应到底作了多少修改或直接抄录。

世的文字中都没有对这一段二人的交往有任何的交代。

孙中山津门上书李鸿章事件中,孙、郑二人的交往同样一直是学术界津津乐道的话题之一。当前比较认同的经过是1894年6月孙中山前往天津中途停留上海找到了郑观应,并请郑写推荐信给盛宣怀,再由盛将孙引荐给李鸿章。夏东元先生所编《郑观应年谱》中指出“据传说孙中山到沪曾到过郑观应家中(郑观应三子润桢所说孙中山曾到过他上海家中两次,这当是第一次到郑观应家中),巧遇王韬在座”<sup>①</sup>。郑观应所写推荐信,除了赞扬孙中山确有真才实学,希望能够引荐给李鸿章外,还请求为他特批“游历泰西各国护照”<sup>②</sup>。尽管如此,本文还是认为,这并不能表示郑观应与孙中山有着良好的私交和密切的交往。刘居上在纪念郑观应先生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所撰论文《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前后的郑观应》对于这一问题的看法比较客观,认为“没有任何资料说明孙中山曾是澳门郑家大屋的常客。……孙、郑二人仍属文字之交”<sup>③</sup>。

## 二、郑观应对革命的态度与郑、孙关系

讨论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就是辛亥革命。孙中山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是武力推翻清政府的领袖。从郑观应的人生经历和留下来的文字作品来看,应该说他对于清政府还是比较忠心的。从人生经历来看,郑观应的几个事业巅峰期都在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包括他早年通过捐纳得到二品顶戴花翎,以及两次短暂的从政。光绪皇帝驾崩,郑观应赋长诗一首《景皇帝挽歌》,从中可以看出郑观应对清廷的高度认可:

嗟我景皇帝, 圣德迈唐虞。……神功卅四载, 方冀庆覃敷。尧年竟不获, 穹苍阻呼吁。鼎湖龙上驭, 薄海泪成枯。丹心萦谱牒, 白发哭江湖。犹幸垂帘圣, 仓皇立帝模。贤王赖监国, 仁政后来苏。立宪期诸速, 日月手重扶。<sup>④</sup>

四川保路运动及武昌首义爆发前后,郑观应正在巡视招商局长江各口,其所著《长江日记》中有一些涉及到了当时的情况:

九月初一日,巴县绅士劝工厂委员谭荷生孝廉……来访,均称“武汉兵变,蜀省民变,皆由立宪不真,动施压力所致”等语。今烽烟四起,米珠薪桂,不死于水旱荒灾,而死于兵戈盗劫,有地方之责者,忍不奏报与仁人君子设法救护乎?

初二日,广东会馆黎客长云:查本埠各帮停搁货物二千万之多,下江输乘之货,售各州县及云、贵两省者,处处风潮阻塞,不能销售;川产下运之货,又以宜、汉变乱,不能交通。金融既复阻滞,货物又已停搁,商帮困难,至于此极!由此推之,各省各埠损失不可数计。

初四日,警报事闻……因游民太多,觅食维艰,人心思乱,幸籍练勇镇压,各国洋商与海关所用洋人皆集议团练自守,且有英、德、法兵船停泊保护也。<sup>⑤</sup>

“蜀通”初八日开赴宜昌,即托俞君浩川带买房舱票,据复已无房位。各友云:“……不如候至下次返宜,先留定房位、随役舱位,并函告宜、汉招呼较妥。”所论甚匙。不料“蜀通”二十二日返渝,据称宜昌军政府拟留往来宜、汉,故托言水浅不去,明春水涨再行。此非官应厄期未满足之故耶?<sup>⑥</sup>

可见,对于辛亥革命,特别是革命带来的乱局,郑观应没有太多的好感,所著文字多是直接描述革命带来的混乱与社会动荡。实际上,郑观应早在广西镇压会党期间以及后来在粤路风潮中就先后与革命党人发生过间接的冲突,特别再联系到他与端方的关系,就更容易看出郑观应内心

①② 夏东元编著《郑观应年谱长编》,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378页。

③ 刘居上《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前后的郑观应》,载《纪念郑观应诞辰17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澳门历史文物关注协会、澳门历史学会2012年版。

④⑤⑥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1407、1028、1031页。

对革命的真实看法<sup>①</sup>。时任川汉、粤汉铁路督办的端方,在成都血案发生后署理四川总督率湖北新军经宜昌入川,后因新军哗变,端方及其弟端锦为军官刘怡凤所杀。郑观应与端方私交甚好,这从《长江日记》中的二人往来记录就不难看出,郑在四川巡视期间,端方曾数次宴请郑观应,甚至希望他能够“同坐‘蜀通’轮船赴渝”<sup>②</sup>。对于端方是否能够完成清廷交办的任务以及他的人身安全,郑观应曾表示过非常的担心,云“闻端午帅定十五日起节上成都,或谓:其不兼程前往,迟迟其行,甚为可虑也”<sup>③</sup>。结果一个多月后,郑观应就听到了端方被杀的噩耗,“俞君浩川来云:端午帅驻军资州,十日迟疑不前,十月初七日为其带来之鄂兵所杀,并其弟叔纲。今鄂兵将两首级送汉,路过渝城”<sup>④</sup>。对于好友端方被杀,郑观应在这里并没有过多的评述,但呼应此前的忧虑,其内心之悲伤毋庸置疑,而之所以没有过多评述,却也正好反映出了郑观应为人之谨慎——不想日后为革命党人有所口舌。

郑观应病逝后,出殡按照前清道台礼仪,也无疑反映了他生前对清朝的态度。从目前可以看到的郑观应70岁和80岁时的照片,能够很清晰地看出郑观应并没有剪掉辫子。所以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革命派通过武力手段推翻了郑观应颇为忠心、又寄予维新希望的清政府,郑观应内心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的态度可想而知。民国肇造以后,革命的果实迅速被袁世凯窃取,在袁氏死后,全国又陷入了军阀割据的状态。对此,郑观应深恶痛绝,在其《待鹤老人晚年纪念诗》中的一首长诗《庚申、己未两岁秋感》中的某些诗句,也许能够明确地反映出他对现状的不满和对清廷的留恋:

英雄谁见造时势,才调全凭演说优。宝剑悬腰终有变,金丹入口始无忧。神仙富贵随人择,道德文章本自谋。八载共和争利禄,民生涂炭几时休。共和底事国仍危,上下凭公乃济私。痛恨台湾林氏产,惊心俄堡党人碑。儒家曼说无因果,报应分明有早迟……烽烟四起羽书忙,底事寰区叫恐慌。护法争权因党系,督军踞地逞豪强。内江剧烈招人侮,外债频加促国亡……豺狼当道不胜愁,政客纷争借箸筹。万姓余膏将削尽,一丝元气有谁留。《危言》良法人皆弃,救世奇文我未酬……议郎论法要无私,藩镇佣兵聊自卫。内江迭起岂共和,外侮频仍忆专制。<sup>⑤</sup>

此诗作于郑观应80岁,此时民国建立已8年。8年来,孙中山缔造的民国发展如何,有没有达到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效果?这首长诗完全可以看作郑观应内心对民国与共和的一番评价,他对于陷入军阀割据乱象、民不聊生的民国几无认同,甚至在诗中明确点出了对前朝的回忆。可见,对清廷的忠心与怀念理应是郑观应晚年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当然也并不能以此认为郑观应仍然希望恢复清朝,毕竟时代潮流如此,反对张勋复辟即是明证,也许郑观应最为遗憾的是他的《盛世危言》和维新良策再也无人问津了,所谓“《危言》良法人皆弃,救世奇文我未酬”明确表达了他壮志未酬的遗憾。实际上,当时不止是郑观应,包括康有为等在内的一大批人都对清廷覆亡导致维新变法成为无可实现的梦想充满遗憾之情。基于此,郑观应对孙中山及其领导下的革命活动的真实态度应该还是比较复杂的,绝不能简单地判定郑观应衷心拥护孙中山。

### 三、反对袁世凯与郑、孙关系

1916年,袁世凯通过洪宪帝制闹剧,当上了中华帝国“皇帝”。郑观应对此强烈不满,积极撰文批判,在《专制叹》中将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比作“强秦”<sup>⑥</sup>。郑观应反袁,有多方面的原因,从整个时代背景来看,当时清政府已被推翻,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袁世凯逆潮流而动,妄图恢复帝制,理所当然遭到绝大多数国人的坚决反对,郑观应反对袁世凯称帝在情理之中。就郑

① 尽管在辛亥革命前夕,郑观应曾经资助过革命军一笔钱(参见《郑观应年谱长编》,第739页),但这并不足以表明郑观应支持革命的坚定立场。

②③④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第1023、1029、1031页。

⑤⑥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第1458—1459、1472页。

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而言,一些观点认为郑观应反袁,实际上是对孙中山的一种支持。当然从客观影响上来说,郑观应对洪宪帝制的反对,的确是对孙中山反袁活动的间接支持,但如果说郑观应此举也可以视为是他对二人早年密切关系的一种呼应那么未免有些牵强。

郑观应反对袁世凯,除了政治的原因外,有更深层的个人关系方面的原因,并且与盛宣怀有直接关系。众所周知,盛、袁二人当年同为李鸿章手下最得力的干将,多年来李对此二人都多有提拔。二人职业发展道路迥异,袁世凯走的是军功路线,颇有政治野心。盛宣怀怀的是实业路线,办厂矿、修铁路,对财富的攫取欲望比较大。李鸿章去世后,袁世凯相继出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练兵大臣等要职,权倾朝野,手握兵权;盛宣怀经过多年的经营,控制了船运、电报、铁路、铸造等国有企业,被称“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几成国内首富。尽管盛宣怀赚进了大笔财富,但在仕途的发展上却远落后于袁世凯,当心怀野心的袁世凯及其北洋系开始抢夺盛宣怀控制下的轮船招商局、电报局等企业时,二人开始走向对立,矛盾日深。显然,盛宣怀斗不过手握重权的袁世凯,但尽管如此,作为盛宣怀的至交好友的郑观应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盛的一边。在1908年袁世凯被摄政王载沣赶回老家以后,盛、郑二人利用这个时机联手夺回了对轮、电二局的控制,算是打了个翻身仗。不过,随着清朝的覆亡,袁世凯摇身一变成为民国大总统,盛宣怀失去与袁世凯进行斗争的砝码,郑、盛二人也只能通过股份控制的形式勉强维持对轮船招商局的实际控制。由此可见,郑观应反袁已久,无法将此看作是对孙中山的支持或者甚至是对二人早年交情的呼应,换句话说,无论有无孙中山的因素,郑观应也一样要反袁。

#### 四、郑、孙二人后期的交往情况

郑观应长期居留上海凡四十多年,民国以后更是绝大部分时间在上海,就职于轮船招商局。随着郑观应的逐渐老去,他的身体和影响力大不如以前。从他晚年在上海的经历来看,基本上除了在轮船招商局还有一些工作以及先后担任了招商局公学的住校董事和商务中学名誉董事外,他的主要精力放在了修道上,尽管也有一些政论发表,但产生的影响已经非常有限了,所以才会有“壮志未酬”的哀叹。郑观应一生好道,在生命的最后几年中,更是完全痴迷于道学,跟随江湖术士万式一做了许多常人难以理解的事情,所耗费的金钱更是不计其数,如建立修真院、购买地产供修道所用、出资刊印道学典籍、负担师傅道友川资等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郑观应生命的最后时光中,修道几乎成为了他生活的全部。就连他一生所推崇的维新救国思想以及颇为重视的教育问题,都被他纳入到了道学的范畴之中。他甚至深深地寄托于通过创建修真院,由上帝指派神灵下凡培养内圣外王之材,以达到救国救世、普度众生的愿望,同时也寄希望于上帝能够尽灭人间的“杀人机器”以实现世界大同。所以说民国之后的近十年时间,是郑观应的生命走向尽头的十年,是郑观应一生中最为痴迷于修道的十年,也是他逐渐淡出公共视线的沉寂的十年。

与走向沉寂和生命尽头的郑观应相比,民国以后的孙中山正值年富力强,声名和事业如日中天。辞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孙中山多次来到上海,并把上海作为他革命事业的重要根据地和策源地,其中有:1911年12月25日抵达上海与黄兴等人商讨组织临时政府等重大事宜,数天后就离沪赴宁就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4月3日,辞去临时大总统后来沪,开始考察实业和专注于社会建设,次年2月10日,乘轮船“山城丸”号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1917年初由日本回沪,积极从事讨逆护法运动,7月赴广州;1918年5月返沪,在上海完成《孙文学说》、《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著述,次年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0年11月到广州重建护法军政府。可见,孙中山每次来到上海,无论短暂停留或是长期居住,都可以视为民国史上重要的事件,与郑观应晚年醉心修道成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以,从时间空间来说,郑、孙二人尽管有很多时间同在上海,但一个是供职于轮船招商局且一心修道的垂垂老人,一个是整天忙于军国大计的民国缔造者,这就决定了两位曾经有过共鸣

的同乡之间再也不会有任何的交集。且二人存世文稿中也无会面的任何记录,更加证明了此间二人无来往。

## 结 语

综上所述,从现有资料以及上述论述来看,郑观应与孙中山的交往实际上并不密切,更非忘年之交。郑观应长孙中山24岁,二人的身份、地位、名气差异及变化比较明显,在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名声渐隆之前,郑观应的地位远高于默默无闻的孙中山。郑观应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支持和对孙中山的高度评价,只是一个长者对后辈青年才俊的推崇与提携,是对其才华的肯定,而并非出于类似于对吴广霁一样的良好的私交。

在孙中山通过革命推翻清政府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其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实现了突变,一跃成为中国第一人。孙、郑二人的地位出现了大逆转,此前显得很有社会影响和地位的郑观应此时已经被孙中山远远地抛开了。特别是郑观应对清廷较为忠心,对民国乱象丛生极为痛心,以及对前朝的留恋,在孙中山走上革命道路且最终导致袁世凯上台后,郑、孙二人更无任何交往。当然,郑观应、孙中山二人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人物,尤其是都长期致力于推动中国变革以摆脱落后、走向富强的事业,且在改革思想方面都有所建树,那么难免在某些问题的看法上相互影响、互为支持和呼应,这也是人之常情,却并不足以说明二人曾经拥有良好的私交。孙中山、郑观应都是学术界研究比较充分的历史人物,他们的每一篇文章、每一封信都有人关注,但是,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发现确凿的资料,证明他们有很好的私交和比较密切的交往。但是,无论二人关系到底怎样,同为香山人的郑观应和孙中山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各自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推动中国走上伟大的复兴之路作出过永不磨灭的贡献。

(责任编辑: 陈炜祺)

## The Further Discussion for the Relationship of Zheng Guanying and Sun Zhongshan

Shao Jian

**Abstract:** Relationship with the Xiangshan's two famous historical figures Zheng Guanying and Sun Zhongshan has always been more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and social, the basic consensus at present is that they have had a very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early, or even "friendship between generations". Zheng Guanying has given guidance and help to young Sun Zhongshan, in the process to In the process of writing to Li Hongzhang gave him a high evaluation and great help. Zheng Guanying wrote the "Zhong Wai Weisheng YaoZhi" has read Sun's paper for reference, "Nong Gong" of "Sheng Shi Wei Yan" also use for reference from Sun Zhongshan's "Nong Gong". Only when Sun Zhongshan run to the revolutionary road, two people began to drift apart. However,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ome key problems, this study suggests that the historical facts is Zheng Guanying and Sun Zhongshan have not a good personal relationship and frequent contact in early time, and also have no contact after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build.

**Keywords:** Zheng Guanying; Sun Zhongshan; Relationship